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动员与效率

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林超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动员与效率

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林超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林超超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161-2

I. ①动… II. ①林… III. ①地方工业经济—经济史—上海—1949—1980 IV. ①F4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211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林超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192,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161-2/F·2420

定价 48.00 元

动员与效率

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跨过 1949：20 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代序）

冯筱才

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出于对当代史研究前景和学术价值的判断，我们开始鼓励近现代史专业的学生，跨过 1949 年的门槛去寻找新的选题。林超超自 2008 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时，便在我的指导下大量搜集和翻阅相关方面的档案和文献，从事当代上海基层社会的研究。本书是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她的研究实践了我们对于当代史学科建设的预想。本人曾将关于当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整理发表于《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这里乃以此旧作代序。

20 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 20 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 20 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例如,1949 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 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他们在研究 20 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 1949 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作整体考察。

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 1949 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 1949 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 1949 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遑论在对 20 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 1978 年之后的 30 年,此前的历史鲜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

正因为如此,公众甚至学者相关的历史知识便缺乏整体性,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化与碎片化,人们很难将这些知识与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思考连接起来。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 20 世纪历史出发去进行比较,去了解传统中国的一些本质特征,可能会更能促使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同时,今日中国的诸多变化,往往也可以从 20 世纪整体史中找到关键线索。30 余年以来,尽管中国在改革实践上

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学术界熟悉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学者,却鲜见有人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对这个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更没有形成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国际性的尊敬。为何会有此种局面?我认为,除去“套用西方理论”及众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与研究使用的资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重建史实,同时不以某种先验的结论为研究前提。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对20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研究,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的资讯以及调查与问卷。但在中国大陆目前不健全的资讯发布体系之下,仅数据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曾经长期与西方国家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他们能利用的资料主要包括报刊、官方公布资料、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访问所得。这些资料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影响了西方学者思考问题的路径。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时段给后人留下的资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后,对档案的重视前所未有。然而,基于大量资料解读与内部视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无论中外学者都不多见。

那么,现在的史料开放程度,是否为学者跨过1949年,进行20世纪历史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必需的基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大量原属于保密范围的档案。许多地方档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执行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定,向利用者提供中共建

政后 30 年间的档案,案卷数量为数甚巨。这些资料与此前被广泛引用的公开出版品,在信息含量方面显然有重大差别,如果研究者能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相信会对过去的历史与特定的问题有全新的认识。当然,在关注开放档案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各类民间史料也层出不穷。比如个人日记、基层单位档案、非正式出版的报刊,等等。如果能对这些资料有系统地收集整理,相信会对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不过,我们也要注意 1949 年后的档案不少是手写的文字,识别与抄录都需要足够的经验。各地基层政府的资料,内容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如何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短时间内不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档案的利用,亦必须与其他纸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将 1949 年以后的资料与此前的资料结合起来理解。一个跨时间的整体史观对我们研究 1949 年后的中国历史是必需的。

随着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民间史料的挖掘,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借鉴西方通行的概念归纳与阐述,也许便可以提出真正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其实,目前中外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些资料的价值,通过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性的结论,只是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一种经验。同时,我相信它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富矿。既然此前的学者能够通过对欧洲经验的总结,提出丰富多彩的概念理论,那么,为何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就不能提供类似的理论创新基础呢?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学者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直接体验,以及在资料搜集与文本解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有利于研究的开展。最近 30 年西方理论的引介,也为学者们

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因此,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 20 世纪中国研究可以有所突破的时候了。

不过,史料的丰富,未必能够带来卓越的学术成果。要提升学术成果的研究质量,首先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规范方面达成共识。否则研究者很难有效利用能获得的材料,亦无法对历史有整体的看法。如何将大量的史料,如档案、报刊、私稿以及口述等纳入有效的整理框架,在学术规范的轨道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严肃讨论,是当代史学者面临的当务之急。其次,多学科的交流亦甚为关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成果并非在历史学界,而是由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所做出的。因此,如何将当代史研究与此前已经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连接起来,并与这些既有的问题进行对话,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社会科学学者与历史学者均能放弃各自的偏见,越过 1949 年,把 20 世纪历史作整体的考察,那么,可以预期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深度会大大加强。历史学者或许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有更多优势。如果大家能携手建立一些大型资料库,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数据,还是现存档案资料的目录提要检索系统,或人物口述史料的系统整理,或许都能解决有效数据不足的问题。同时,学术界若能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一些跨单位、跨专业的研究群,吸引一线研究的学者,并与海外学者展开密切交流。这样,便可以预期,未来将在 20 世纪的整体研究领域取得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风浮躁,有时未必完全是学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加是某种学术机制或环境的产物。如果学术界能对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富有创见的解释。那么,无论是对理性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目 录

跨过 1949:20 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代序)	冯筱才	1
---------------------------------	-----	---

绪论	1
----------	---

一、问题的提出	1
---------------	---

二、文献综述	2
--------------	---

三、几个概念的厘清	6
-----------------	---

四、研究思路与论述框架	8
-------------------	---

五、研究方法与主干资料	10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上海工业企业的改制	14
--------------------------	----

第一节 接管与改造	14
-----------------	----

一、私营经济的恢复与改造	15
--------------------	----

二、国营经济的建立与管理	17
--------------------	----

第二节 从民主改革到生产改革	20
----------------------	----

一、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	20
-------------------	----

二、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	23
-------------------	----

第三节 苏联模式的搁置	28
-------------------	----

小结	34
----------	----

第二章 计划与效率：“大跃进”前的制度化	43
第一节 技术普及	43
一、学徒制度的演变	44
二、技工学校的培训	47
三、“先进经验”的推广	49
第二节 组织管理	54
一、计划管理	55
二、指标激励	58
三、内部监督	63
四、国家监督	71
第三节 劳动激励	73
一、生产动员与劳动竞赛的兴起	74
二、劳动竞赛的制度化	76
三、“难产”的经济激励	84
四、工厂里的政治文化	89
小结	91
 第三章 动员与效率：“大跃进”中的计划管理失序	 108
第一节 权力下放与指标体系的失控	108
第二节 技术革命与国家动员	114
第三节 “鞍钢宪法”与反制度化	124
小结	130
 第四章 纠不了的偏：“大跃进”后的制度重建	 138
第一节 “大跃进”之后的经济纠偏	138
一、指标收缩	138
二、精减人员	142

第二节 《工业七十条》的问世	149
第三节 试办托拉斯	154
第四节 “三五”计划的编制	164
小结	167
 第五章 稳住生产:特殊年代的工业组织	175
第一节 “社教”运动中的工业组织	176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业组织	181
一、革命与生产的拉锯	181
二、“工人造反派”的行动	185
三、计划管理的失常与恢复	190
四、“七·二一”大学的兴起	195
第三节 “四五”计划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	199
小结	202
 第六章 效率优先与上海工业企业的改制	210
第一节 政治变局与经济纠偏	210
第二节 打破禁区	212
一、“洋奴买办”	212
二、“企业自治”和“利润挂帅”	215
三、“奖金挂帅”	217
第三节 理论重建	219
小结	223
 结 语	227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8

图表目录

表 2-1	上钢一厂 1955 年实际完成指标、1956 年国家计划与 增产节约指标比较	59
表 2-2	1956 年工资改革前后全国、上海工业企业职工工资 情况	85
表 2-3	1956 年工资改革前后恒丰纱厂职工工资情况	86
表 3-1	1953—1965 年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国民收入 情况	114
表 3-2	上海市工业企业每千名工人中四级以上技术工人人数 统计表	121
表 3-3	1953—1960 年全国、上海职工伤亡事故统计表	129
表 4-1	上海市几个工业系统企业 1962 年工资总额控制指标	146
表 5-1	1965 年和 1976 年上海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比重 比较	198
图 2-1	领料单与退料单式样	64
图 3-1	1952—1963 年上海市工业生产总产值	124
图 5-1	1963—1976 年上海市工业生产总产值	180
图 5-2	1965—1980 年上海市国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曲线图 ...	195
图 5-3	1966—1976 年上海市缝纫机、自行车、钟表行业利税 情况	202
图 6-1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示意	223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就宏观而言,本书的讨论对象是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在英文世界,“经济”(economy)一词最初是由希腊文 *oikonomos* 转译而来,希腊语 *oikos* 指家庭,*nomos* 是管理的意思。^[1]“经济”脱胎于“家庭”,这一点不难理解,中国古语也有齐家治国云云,国家就好比一个大家庭,政府于其间充当起大家长的角色。经济,实则一门管理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给予每个成员他们所要的一切事物,社会资源的这种稀缺性使得对它的管理变得十分重要,任何一种制度下的国家都不例外。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ános Kornai)在他的代表作《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中专门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作了层层剖析:人们可能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到商店购物时碰到短缺,或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分配住房时碰到短缺,也可以是作为一个生产者碰到原材料上的短缺。^[2]毫无疑问,以上种种短缺现象亦是 20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的最佳写照。短缺不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家的管理者们对于未来的规划和现实决策,摆脱短缺客观上要求效率(*efficiency*)的提升,更何况于 1949 年后的中国经济是在高速工业化

的诉求中前进的。不难想见,低起点和有限的社会资源愈发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新国家孜孜以求的经济增长动力。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投入)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已经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对于研究者而言,它更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清晰地记录了历史的复杂轨迹和完整面相。1950—1980年,作为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各项经济方针都处于初创阶段并在不断调适当中,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可谓喜忧参半。对此,我无意于给出是非好坏之评判,或是利大于弊、弊大于利之权衡,而是期望通过对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的考察,从而对新政权的执政理念及其扎根的社会结构背景给出一个合理的阐释,在这其中,国家所遭遇的难题,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国有企业绩效改革这一“老大难”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现代工业生产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组织现象,所有的生产者(包括管理者)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组织当中,各司其职。如何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生产技术是一个客观变量,除此外,让工业组织更有效率地运转起来对于1949年以后的新国家而言,更加契合当时的发展条件。事实上,再苛刻的学者也无法否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确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194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从1952年至1957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5.7%;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1957年至196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3%。^[3]据美籍华裔学者章长基(John K. Chang)对1949

年以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分析,1912—1949年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率为5.6%,其中1928—1936年为8.4%。^[4]这也让同一时期的海外学者更愿意相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正在沿着国家预设的轨道上大幅前进。

早先时候倾向于“集权主义”模式^[5]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一般强调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对社会施加的监督和控制。鲍大可(Doak Barnett)在他的一部著述中得出的如下结论,很能代表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它还是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纪律的精英团队和一个新的党政机构,藉此将党的最高意志向中国的大多数人口贯彻到底;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法律传统的相对缺失,意识形态就成为了最好的政治资源和手段,1949年以来高频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是出于强化官方意识形态的目的。^[6]和鲍大可一样从意识形态和科层组织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还有舒尔曼(Franz Schurmann)。^[7]

这种观点一直影响至今,不过其间它也遭受到了一些挑战。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海外学者开始反思学术前辈对于集权国家国家意志理想化和一元化的想象,他们使用了当时美国学界盛极一时的“多元主义”模式(或称“利益集团”模式),对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了重新发现与定位。多元主义模式主要是以美国实践为蓝本发展起来的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特别强调以美国为典型的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利益集团政治”。这一政治现象,又称“利益集团模式”,它认为,社会存在多重竞争性的利益集团,且各利益集团是相互平行、彼此独立的,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又一起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与政府进行“对抗”,对政府施以监督和制约。这种从西方世界假借而来的理论预设,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自有特质。^[8]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海外中国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通过与 80 名中国大陆移民的深度访谈,注意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国营工厂内部存在于工人与单位组织领导私人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即工人以政治效忠为代价换取物质利益和政治前途,领导以“任人唯亲”的原则在基层中发展稳固的人事关系,从而形成工人对单位及单位领导的高度依附。^[9]新的分析视角从利益双方的行动策略出发,对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有了更加人性化的把握,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同时,魏昂德的研究也开启了以“单位”这一微观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组织 and 制度的先例。

在中国学界,单位现象已经成为时下对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基层组织架构最普遍的一种解释。多数研究都强调单位(主要指国营企业)的控制、整合和调控性质,把单位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或者说统治工具。^[10]就单位体制的效果而言,这种说法是有它的道理的,但若追究单位的缘起,我们就会发现,它过多强调单位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单位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忽略了国家若要藉此实现社会控制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事实上,国内对单位体制较早作出归纳阐释的研究者就已经提醒我们注意,通常被作为集权产物的单位体制实际上非常容易造成权力的分散。在公有制度下,由于对单位领导人的考核与提拔并没有与这些组织的经济活动和绩效形成一个对等的激励机制,且不说基层企业的上级行政组织(部、局)可能为维护本系统利益,与国家或政府的立场发生偏离,就是基层企业内部的行政组织也经常可能通过虚假隐瞒等行为掩盖事情的真相。^[11]

将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作为切入点,一个事实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中国的单位体制中,国家“处心积虑”地编织了一个行政中枢网络,一方面确可实现国家指令和动员网络的畅通无阻,